

中國大陸維吾爾民族意識考察 —湖南常德地區田野調查

石之瑜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摘 要

維吾爾族人吃豬肉可能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但如果從民族遷徙、通婚、政治經歷來理解，這又不是那麼不可想像。其實，對南疆維族人而言，這是家族重遇，充滿著驚喜與同情；對中共官方和黨而言，風俗習慣並不同於民族身分，應當任其自然發展；對伊斯蘭教而言，這種現象只能潛移默化；而對常德的維族而言，這表示要摸索出民族特色確實不易。多少維族人會吃豬肉，將成為未來一個有趣的觀察點，因為這是民族認同變化的風向球，而十年後又會有多少阿訇（伊斯蘭教基層神職人員）出現在常德，則又涉及民族意識、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三者的關係在常德出現的斷裂，究竟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新時代的定律。不同的人或同一個人從不同的角度對民族意識或持正面或持負面的態度，但學術界迄今仍未建構出一個比較妥當的理論來說明民族意識的多層面意義。

壹、前言

許多民族研究者對於少數民族的界定有所批評，認為少數民族的概念充滿了武斷性，¹或認為探究少數民族溯源的工作會誇大他們與其

他民族之間的差異，而且會把隨著時代與環境變遷的當代少數民族所作的調整，²有意無意地在界定少數民族的過程中加以忽視。這些批評有一定的道理，因為經過遷徙、融合的歷史發展(即令是在血緣上)，今日的少數民族也必然與其先祖會有相當程度的差別。在今日的中國大陸，一個人只要雙親之一為少數民族，就可以任擇其一為自己的民族身分。在漢族與少數民族通婚比較頻繁的地區，血統融合固然比比皆是，但人們仍得以保留少數民族的身分，滿族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

不但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通婚不斷地改變漢族的內涵，少數民族彼此之間的通婚也相互形成融合。隨著現代化的來到，少數民族彼此間的通婚益加頻繁，這可以歸功於兩個因素，一是現代主權國家體制的建立，將屬於不同民族的人都視為國家公民，為少數民族之間平等相處提供了一個法律上的條件；二是市場經濟的引入，使民族之間的交流成為自然而然的事。在多種民族聚居的地方，八〇年代之後，民族之間通婚的確越來越頻繁，即使在歷史上存在嚴重民族矛盾的地方也不例外。像民族最多的雲南省正是民族融合最典型的地方，出了雲南省，其他大山大寨族際的通婚也極為平常。

通婚頻繁的現象似乎並沒有完全消弭在法律上一個人只能屬於一族的規定。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區為例，過去土家族和苗族之間有其矛盾，土家族傾向接受冊封，而苗族則始終對天朝有抗拒。當時的祖輩一定很難想像今日土、苗之間的通婚。可是中共官方並無意為通了婚的土、苗兩族另創一個土苗族，他們所生的子女在法律上仍然是非土即苗，這就說明了一個法律制度對少數民族研究所形成的制約。本文選定一個研究點，針對已經通婚而且在概念上已經突破法律

1. Stevan Harrel(ed.), *Cultural Encounters with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2. Gerald A. Postiglione (ed.), *China's National Minority Education* (New York: Falmer Press, 1999).

限制發展的地方進行實地考察，以了解當地人究竟是如何體會變遷現象的。

本文考察的對象是湖南省常德市下屬縣級政府所管轄的兩個民族鄉，一個是桃源縣楓樹維吾爾族回族鄉，一個是鼎城區許家橋回族維吾爾族鄉，而以前者為主。鄉名之中以維族在前的，表示維吾爾族的人口相對多於回族，反之亦然。當地人通稱這些鄉民為回維鄉，故即使在法律上人們仍然非維即回，但是在一般生活中，回維之間的區隔何在，其實不是血緣所能說清楚的。

本文旨在說明，在法律上，維族身分的認定和回教信仰的持續，使得身處漢族居民層層包圍的維吾爾人，保持了自己的民族認同或民族意識；然而從與回族通婚、漢民雜居以及歷史因素所造成宗教信仰流失的影響，又可以看出民族融合與變遷的力量正在改變做為一個維族人的意義。本文要說明的是，民族意識沒有一個意義明確的定義，所以不同的人或同一個人從不同的角度，會對民族意識或持正面的態度，或持負面的態度。然而，迄今學術界仍未建構出一個比較妥當的理論來說明民族意識的多層面意義。³ 本文不敢宣稱有這麼一個理論雛形，只是想藉考察來凸顯一些值得進一步研究的現象。

貳、湖南常德回維鄉概述

本文考察對象包括兩個鄉的鄉政府，兩個鄉的鄉中學與小學，楓樹鄉的一座清真寺，支援它的一座常德寺的清真寺，楓樹鄉的一家農戶，一次許家橋鄉的祭祖，常德市教委；並與鄉長、鄉人大、校長、教師、老師傅、村委會委員、農民、教長、宗教局科長、前統戰部宗教事務官員、教委會主任、官員進行晤談交流；除了在教委與鄉政府

3. Chih-yu Shih, "Ethnic Economy of Citizenship in China: Four Approaches to Identity," in M. Goldman and E. Perry (eds.), *The View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有正式簡報外，其餘屬於即興式的訪談紀錄。本文將闡明，維吾爾族鄉民意識的流失與該地族人的散居形式、通婚模式和歷史際遇有關，民族意識的再生則與民族身分的界定、信仰活動的復甦、民族政策的鼓勵有關。而信仰活動得以恢復基本上與回民聚居融合所提供的信仰環境有關，至於信仰活動的恢復和流失則又是同時進行的一種變遷現象。⁴

在湖南出現維吾爾族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據當地政府的考據與鄉民共同的認知，維族祖先在明朝時因前往南方鎮壓苗族動亂有功，接受皇上冊封，住在常德地區，並受賜姓為翦，而被封為「鎮國定南大將軍」。依據湘西吉首大學一位教授的研究，以許家橋鄉為例，當地有翦姓與黃姓兩個大姓，前者是維族，後者是回族。不過，在一次黃氏家族的祭祖活動中，從家族墓碑上卻很明顯地看到，黃氏祖先在明朝也有戰功，而受封於此。黃氏既為回民，可見當初爭戰並非只有維吾爾族而已。黃氏家族墓園的墓碑上，也清晰可見黃、翦先人通婚之事，早年即已發生，所以常德回、維之間的區隔，起碼在血緣上是無法被完全清楚地劃分開來，而姓氏作為民族血緣的象徵，只是一個程度的表述，並不是絕對的。除了翦氏以外，還有一支由南疆遷來的賽姓維族，三者構成了今日湖南維族的整體。

維族人已經不操維吾爾語，極少數的清真寺老師傅略通阿拉伯文。⁵不過，在當地方言中仍保留了若干維吾爾詞彙的一些習慣，在人們見面相互問候時、講教時、致謝時、告辭時、叫人吃飯時，都可以聽到。傳統維族人的服飾和生活習慣已不復見，僅在舉行民族節日或宗教儀式時方可見到。在維族街道上，可以看到家家戶戶都兼營一些小買賣，不過主要的生產活動還是農業和家庭畜牧。

4. 關於回族認同的變遷與建構，請見 Dru C Gladney, *Muslim Chine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5. 同註 2，pp.148-149.

楓樹鄉三萬多人口中，少數民族有八千多人，主要就是維吾爾族與回族。1986年，中共當局正式批准成立維吾爾族回族民族鄉。民族鄉與自治鄉不同，在自治鄉，鄉政府的領導幹部必須由少數民族擔任，而且在一般事務上行使自治。但民族鄉沒有這些統治權力上的保障，惟其所享受的政策優惠則和自治鄉相同。有的時候，民族鄉未必希望成為自治鄉，而是希望升格為鎮，因為中共對於鎮民和鄉民的管理方式不同，一旦成為鎮，則住民就是城市居民，在供電、就學等各方面，都可以獲得中共地方政府的保障。至於鄉民則仍屬於農民，在政策上應當是自負溫飽的，沒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權利待遇，然而一旦成為鎮，就不能再施行自治了。不過，許多人寧願當鎮民，而不是自治民。

自從民族鄉建立以來，楓樹鄉的經濟得到很大的發展；當地政府在基礎建設上逐年投入，使得糧產和棉產都大量增加；該省省政府全力推廣雜交稻，規定農民只能上繳雜交稻，這對產量的增加有很大的幫助。到1995年，農業總產量翻了五番，與當地民風民俗較為密切的產業如牛製品加工、孵化業和養殖業，也都由於鄉政府投入品種研發和技術改良而突飛猛進，形成城鄉經濟發展主要的支柱。此外，回維鄉還被湖南省政府選為農業綜合開發試點，全鄉投入十萬勞力單位，提供配套資金超過13億元人民幣，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灌溉系統。

楓樹鄉的維吾爾族回族鄉中心小學，是由光緒年間的一座私塾逐漸發展而成的，後來成立董事會，命名為具有民族色彩的「鎮南小學」，時為1927年，主持擴建的是史學大師翦伯贊的父親。到1952年改為桃源縣的民族小學，文革期間增設了初中與高中，更名為楓樹中學，為了便於中小學同時管理，在1983年又更名為楓樹公社民族學校。1986年，隨著民族鄉的成立，中、小學已正式分家，定名為中心小學。校址就設在維吾爾族主要的大戶翦氏宗族的祠堂，目前有十七個班，另外還包括了一個幼童的學前班，在八百多名學生中，民族學生所佔的比例不到40%，民族教師的比例約佔總數的22%。

從各鄉政府的簡報中可以發現，地方政府所關心的問題，未必與民族直接有關，上級政府來檢查的重點在於經濟發展狀況以及基礎建設的維護。至於與民族文化有關的活動是否活躍或受到適當的支持，則屬次要問題。同樣地，教委到學校檢查的重點，照許家橋小學的陳校長所說的，包括了課堂的教授、老師的背課、課表的設計、按表實施的情況，與民族文化有關的，就是素質教育，但其所關心也僅止於學校有沒有太重視分數，鄉政府有沒有太強調升學率而忽略了全面發展等問題，這些並不直接和民族文化相關。

參、民族意識的復甦

理論上，維族和回族最大的共通點在於他們都信奉伊斯蘭教，相異之處則是血緣。⁶中國主要的維族人住在南疆，在常德地區的維族人祖先也是由南疆遷移過來的，而回族人則是中亞、阿拉伯人到中土之後與漢族融合所形成的。當他們共居一地之後，這個血緣上的差異就越來越不明顯。然而，這並不影響人們用血緣的角度，將自己的民族認同回溯到一個特定的祖先來源。血緣的重要性，在一般村民心目中比伊斯蘭教的信仰可能更具關鍵性。首先，在1996年時，回維村的村委會經過了幾年的投資與研究，巨細靡遺地將翦氏族譜蒐羅完全，其他流落海外的翦氏家族也包含在內，捐資完成這項工作的人之相片，則印在族譜的最前面，洋洋灑灑一共好幾大冊。這些族譜清冊集在一起，鎖入一個棕漆的小木箱之中上鎖，擺在客廳正對門的牆前桌上，任何客人一進門首先看到的，就是這個族譜箱。由於這項族譜的編纂

6. 關於早期回族意識的討論，請見 Ma Shouqian, "The Hui People's New Awakening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n Dru Gladney (ed.), *The Legacy of Islam i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Memory of Joseph F. Fletcher*, Conference Volume, Harvard University, April 1989, pp.14-16.

工作是由族人捐資所完成的，故並不受村經濟實力之影響。早年沒有推動這樣的活動，一來是受到政治氣氛的影響；二來多少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後民族意識有所復甦之故。基本上，民族鄉的建立在這方面有絕對的影響力，更重要的是一些維吾爾族領袖的推動。

這些外來關注的第一個高潮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司馬義·艾買提的到訪，由於他本身是新疆的維族，在新疆可以說動見瞻觀。他來訪之後，楓樹鄉就與新疆電視台取得聯繫，將常德維吾爾族的來歷與近況做了報導，因而引起新疆維吾爾族廣泛的注意與興趣，畢竟過去多數人並不知道有這樣一支族人遠流湖南，當時是 1990 年。那年以後，新疆的維吾爾族年年都會有人來楓樹鄉了解情況，尤其關心當地維吾爾兒童在學校學習的狀況。中心小學翦副校長回憶說，遠來的客人一看到她時，第一個反應就是她的五官長相準是維吾爾族沒錯。有時，遠客會給中心小學提供一點資助。也有人是來作研究的，尤其是有維族血統的學者。翦副校長感覺這些客人對當地的狀態感到特別關心。

原本在統戰部負責宗教民族事務的陪同人員李科長，解釋了兩地維族人接觸的狀況。接觸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由官方組織的，比如在維族實行自治週年慶的時候，另一種則是由民間自發組織的，這又分為幾種形式，最常見的是經過伊斯蘭教協會組織來的，其它包括個別學者、商人、社會運動家都有。來訪的人通常最初的反應是，「很驚訝、很好奇」。人們看到最大的差別，就是常德的維吾爾語言完全消失了，而服飾也失去了維族的傳統風貌。

新疆維族近年從事分裂主義的活動，⁷這點對常德所產生的影響目前並不明顯。李科長認為，常德不像南疆，當地有跨國界的活動，而這些活動又是蘇聯解體之後才變得比較嚴重，但常德沒有這些條件。

7.關於跨國的伊斯蘭活動，請見 Dru Gladney, "Transnational Islam and Uighur National Identity,"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11, No.3, 1992, pp.1-18.

鄉人大主席馬先生將南疆維族人來常德考察的現象，理解為家庭團圓的一種溫暖的事，他總結說：

新疆來的我們接觸比較多，因為湖南有一萬多個維吾爾人，他們想來看一看。老家來的嘛，也是一種大家庭的溫暖。我們也有一些政府裡的人去過，像支部書記去過，他是村裡的，婦聯的也去過，都是由中央組團，在維族自治三十週年和四十週年慶的時候都有人去過。他們每年都有人來，基本沒間斷，主要看學校，到農村。來的人文化層次不同，欣賞能力也不同，整體來講，他們比我們發達一些。不像西藏那樣落後，新疆是國家政策的重點，享有很多優惠。

不論是村民集資大規模地重建族譜，或是和新疆維族人建立聯繫，都是關於血緣方面的溯源工作。這種建立在血緣觀念上的民族意識，有將民族認同本質化的傾向，這和從 1980 年代早期以來日見頻繁的回維通婚趨勢其實並不是一致的。有趣的是，維族人過去幾十年一向信奉的伊斯蘭教，卻在不斷式微，在這個民族意識復甦的過程中，重建對伊斯蘭教的信仰應該是很重要的，回族人可以提供最好的宗教環境。總之，不論是通婚的現實或信仰的重建，雖與以血緣為內涵的民族認同方向不同，但卻同時發生。

肆、風俗與認同之變遷

楓樹鄉維族人的伊斯蘭教信仰與回族人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認為，維吾爾人的民族身分、伊斯蘭教義的學習與信仰以及生活風俗習慣，三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⁸ 所以身為維吾爾人並不一定要信仰伊斯蘭教，信奉伊斯蘭教並不一定要過回教式的生活，其中的關鍵就是

8. 這種依情境而有多種認同論述並存的現象，並不限於本文的研究對象，請見 Chih-yu Shih, "Multiple Constructions of Ethnicity,"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April 7, 2000.

養豬與吃豬肉的禁忌。像年紀大的人，可能又信奉伊斯蘭教，又過著符合教義所規範的風俗習慣。具中國共產黨員身分的維吾爾人雖表明自己不信教，卻又堅持一些教義所規範的風俗習慣。許多年輕人又不信教，也不忌食豬肉。但也有從幼年起就學習教義、讀經書，卻仍然吃豬肉。對於老一輩的維族人而言，他們有較強的民族意識，對吃豬肉的現象不以為然。一位當時來鄉訪親的台灣教授，她本身雖非伊斯蘭教徒，但因為父親很虔誠，故對回維鄉民吃豬肉也頗難接受。

在楓樹鄉中學任教的前任校長馬老師是共產黨員，不信教，但卻很自豪的表示，他在生活中不但「保留民族特色」，而且還是「全部保留」。楓樹鄉回維人民吃豬肉是政治因素所造成的結果，這個結果就協助人們得出不同教義的解釋。按伊斯蘭教，吃牛、羊、雞都必須由專門負責宰殺的阿訇或老師傅操刀，並且必須頌可蘭經，因為萬物屬於真主，必須真主同意才能宰殺。從來沒有阿訇是負責殺豬的，對於教義的寬鬆解釋，有利於接納更多的教民。通過宗教活動的影響，讓族民將來回到傳統生活習慣，「只要將來不再做，我們都竭誠歡迎」。

除了吃豬肉之外，還有養豬的問題。在多數伊斯蘭教地區，畜牧業的主力是牛與羊，看到了有養豬的就知道這是到了漢民的家。但在常德地區，既然吃豬肉已經是司空見慣，更遑論是養豬了。養豬最主要的誘因當然是經濟的考量，豬肉與豬糞都有經濟用途，所以在楓樹鄉維回村民家中養豬不奇怪，反而不養豬才奇怪。馬校長自己也因為要增加經濟收入而養豬，和他說自己保留全部風俗習慣的說詞似乎並不一致。他特別還強調，即使是「看到豬很髒也沒有關係」。

伍、民族教育文化的探索

從關於民族特色的討論中，⁹可以得知，維吾爾族存在著一些失落，尤其以年長的感受最深。楓樹鄉民族中學熊校長強調要建立一個有民族特色的學校，而他舉的例子竟然是，學校創收的經濟實體養豬業，目前已經超過三百隻，學生參與可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除了貢獻勞力給學校外，也能將技術帶回家，既能提昇地方經濟，又能讓他們畢業之後成為地方上有用的人。他接著提到素質教育方面的示範初中，他了解到這方面尚在起步，而且「什麼是民族特色，還在摸索」。

目前，比較明顯有民族特色的活動有兩個，一是二胡的培養，二是民族體育。與一般運動會不同之處在於後者所重視的是選手所代表的學校，對其民族身分的學生並沒有認可的作用。至於民族運動會，它可以讓人們在欣賞的時候具體認識到民族的表現。為此熊校長已特別開始培養比賽的選手。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摸索民族特色的過程中，人們最後回歸的並不是以某種文化、風俗、價值為內容的活動，而是以血緣為中心的身分表現。

事實上，家長也不期待學校太強調素質教育和民族特色，一般更重視語文和數學的分數；有的家長甚至擔心素質教育會影響到升學率。許家橋的中心小學陳校長及常德教委的黃科長都認為，應對家長宣傳素質教育。黃科長還指出，省教委有鄉土教材介紹民族的歷史，另外正在實驗有關民族知識的教學。但所謂民族知識，是把民族當成是一個科學描述的客觀對象，主要是幫助漢族學生認識少數民族，並不屬於有民族特色的教育。還有與民族有關的教學就是關於「黨的民族政策」，這是放在思想品德課中，屬於政治教育的一部份。對地方政府而言，民族教育有三個難點，第一，辦學條件不夠，學校基礎建

9.同註2。

設不足；第二，民族學生中貧困的相對較多，也有住地偏遠的，要不要為了少數人特別設置教學點，值得斟酌；第三，缺乏適當讀本作為教材。

最後一個關於民族教育的面向，是關於民族教師在整體師資結構中的比例問題。一般而言，小學中的民族教師比例較高，以來自本鄉本土和女老師居多，這在維回鄉和回維鄉都是如此。到了初中，漢族的、男性的、非本地的老師逐漸增加，到高中以後更是如此。在流動率方面，漢族老師顯然比民族教師要高，民族教師如果不是在本鄉，也常分配在鄰鄉。許家橋鄉聯校(高、初、小)校長楊先生認為，民族教師因為宗教信仰關係，比較重視衛生，所以他的三所學校管理的素質要比其他學校高，從訪客的直接觀察，確實是比較衛生，這包括有超過百餘幼童就學的許家橋鄉小學學前班在內。

陸、宗教信仰的恢復

民族特色的摸索既然得不到具體的內容，轉而強調民族身分是很自然的事。出了校園，追求民族特色的活動，便以宗教信仰的恢復為主了。楓樹鄉一所清真寺的一位老師傅就指出，每逢週二與週日，就有二十到三十名小朋友來寺裡學習禮拜辭，大概三個禮拜就可以學會，接著就學習阿拉伯文的 28 個字母。週五下午講經的時候，平面聽講的只有五、六個人，如果是節日就會有十幾個，送孩子到寺裡學經是民族意識恢復的徵兆。¹⁰

這所清真寺的經濟狀況並不很理想。首先，他不像一般清真寺那樣乾淨，建築破舊，一樓甚至成為堆積場。寺的管理委員會半個月開一次會，經常討論的就是籌集資金的事。寺與村委會比鄰，中間沒有

10.關於宗教儀式的標準化，請見 Wang Jianping, "Concord and Conflict: The Hui Communities of Yunan Socie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und Studies in African and Asian Religions* 11, 1996.

圍牆，在同一院子中。在場的一位村委翦先生說明村對寺的投入，是以建寺時的勞工投入為基礎的。現在每逢封齋日或有活動，村委會就加派人手，接待來參加活動的村民，負責安全，提供各種必要的服務，並且買菜準備食物。翦先生回憶，在 80 年代並沒有這種活動，後來民族意識強了，活動慢慢恢復。過去受到政治的影響無法推動，幸好村中那些 80 與 90 多歲的老人「堅持下來了」。阿訇在講經時會幫忙中共官方做一點宣傳，可以發揮很大的影響，解決很多問題。更重要的，它可以在婚喪喜慶的時候，勸村民按照伊斯蘭教的儀式，對村裡的民族意識恢復有所助益。

按照中共的政策，黨員不可以信教，小孩子在 18 歲以前也不可以強迫他們信教，除非是自願。所謂自願，就是在家長的要求下，將小孩子送去寺裡學經。楓樹鄉雖然有兩個清真寺，開學時阿訇卻只有一個，在許家橋鄉有三個寺，也只有一個阿訇。因為財力有限，阿訇每年來寺兩個月，是由常德古寺的伊斯蘭教協會幫忙聘的。老師傅則是業餘的，每個寺由一個老師傅負責衛生。楓樹鄉清真寺的老師傅由寺管會一年支付他微薄的三百元人民幣表示謝意。但在一般家裡有活動時，阿訇和老師傅前往主持的話，村民有時會有所供養。前面提到的祭祖儀式，阿訇與老師傅都唸經文，家屬後來提供每個人一百元的供養。至於小孩子唸經書，根據人大馬主席的見解，都是出自興趣，起碼大人有機會觀察這個孩子有沒有「為民族服務」的心願，來決定要不要在這方面培養他們。

常德寺的清真古寺在培養下一代方面比較有系統，寺管理委員會裡已經出現只有三十出頭的阿訇，都是經學院畢業的，馬主教說明古寺的訓練：

從幼年時期學習，我們就被送去深造，成為寺管會成員。講經一方面要教做人的道理，一方面要把阿拉伯文用漢文翻譯出來，學生的工作量很大。我們都是兼職，我家是阿訇之家，我就是在清真寺裡培養出來的。但我們不強迫兒童信教。

民族意識與宗教信仰的恢復既是政治變遷的結果，也對政治產生影響。在 80 年初期宗教政策剛放寬的時候，許多人還不太相信，不敢表現的太熱衷。在政策逐漸落實以後，聽經的人就逐漸增多，每逢星期五，少則六十多人，多到七百餘人。馬主教覺得這是「反映了人心的狀態，覺得宗教可以使人作為高尚的人，建立人與人的親切感。」但一般固定來做禮拜的不多，主要是青年必須工作，很多老人在家，只要「在一個小屋裡，毯子鋪上就可以」。由於經濟條件不足，常德還沒出現過曾從麥加朝聖歸來的哈吉。也同樣因為經濟能力有限，寺裡能收容幾個阿訇完全看當時的財力。透過伊斯蘭教會的牽線，湖南省得以向阿拉伯銀行請求資助，在長沙建了一所阿拉伯文的學校。不過，中共官方本身從來沒有資助過清真寺，雖然宗教局總是希望寺能「建更高一點，辦更好一些」。

宗教局的翦科長說明宗教局與清真寺的關係如下：一是官方要保護清真寺的利益；二是政府部門有些政策會要求清真寺協助落實；三是官方從政策上要保證宗教活動的正常化。至於寺廟內部的事必須自己管理，除非政府被動應要求介入來協調內部糾紛。馬主教明確表示，講經要結合經訊與國家政策；古寺的寺管會每星期要開會，除了處理日常事務，另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在政策開放的潮流之中，宗教局十分鼓勵清真寺能更有效地籌募資金，古寺除了與廣東的伊斯蘭懷聖清真寺聯繫外，的確也想「借東風營造，準備創收」。

古寺一旦進行創收，其政治性就會降低，但政治能力卻會增加。古寺從兩方面來增加前一個效果，降低後一個效果。一方面，古寺準備在飲食方面進行一些項目，辦好副食品，目前已經有不定期的創收，是利用節日慶典時販賣食品，一年大約有一萬元的收入，現在希望將之常規化，成為固定的收入。另外還有一些房地產出租，增加收入。這些收入可以容許古寺對楓樹鄉和許家橋鄉提供更大的支援，目前又正與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美、日等地的宗教界有交往，並

希望送更多的學生去深造。因此長期來看，將來古寺透過宗教網路的社會影響力會逐漸增加，而這不可能不引起一些政治上的關注。

古寺老師傅的反應與其說是謹慎小心，不如說是超越政治，也就是真心誠意的堅持思想品德教育，從根本做人的道理教起，則和政府的關係自然良好。八十三歲的翦老師傅說：

要在黨的領導下培養學生，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和平；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還有勞動：諸葛武侯都勞動耕田，要學習。我們民族宗教在共產黨保護之下是平等自由的，不但平等，還被照顧，像找工作、升學、職工的薪水都多給。教學生要守紀律、學知識，不要馬馬虎虎。要樂善好施，這種精神難能可貴。台灣為中國遭水災送幾萬塊錢是愛家鄉的體現。錢有多多的，就辦學、濟貧。對真主、對中央要忠，對父母要孝。有些台灣家屬來寺，我們特別歡迎，為了和平，為了團結。我讀阿拉伯文不深刻，但伊斯蘭教的大公無私我相信。

柒、結語

維吾爾族人吃豬肉可能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但如果從民族遷徙、通婚、政治經歷來理解，則又不是那麼不可想像，¹¹只是這個現象所代表的意義卻因人而異。對南疆維族人而言，這是家族的重遇，充滿著驚奇與同情；對中共官方和黨來說，風俗習慣並不同於民族身分，應當任其發展；對伊斯蘭教而言，這種現象只能潛移默化；對常德的維族自己來說，這代表要摸索出民族特色確實不易。既然意義不同，人們對宗教活動的恢復也會有不同的期待；老一輩的希望，這可以是民族意識恢復的一個基礎；中共官方認為，可以藉此爭取向心力，並

11.關於回族認同論述的變遷，請見 John Bowen, *Muslims through Discourse: Religion and Ritual in Gayo Societ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藉以宣導政策；小孩子則增加了一個有豐富人生意義的生涯規劃。

有多少維族人會吃豬肉將成為未來一個有趣的觀察點，因為這象徵著民族認同變化的總方向，十年後有多少阿訇會出現在常德，則有助於我們了解到底民族意識、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三者之間的關係在常德出現斷裂，究竟是一種歷史的偶然，還是新時代的定律。

(收件:2000年3月3日，修正：2000年4月6日，採用：2000年7月7日)

A Field Study on Uygur Ethnic Consciousness in Changde, Hunan Province

Chih-yu Shih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Uygurs in Changde, Hunan Province have distinctive ethnicity,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customs. As a result, some young Uygurs do not practice Islam and eat pork, while some practice Islam but also eat pork. As for senior Uygur party cadres, they follow Islamic customs without actually practicing religious belief. The rising ethnic consciousness in recent years witnesses higher devotion to religious activities while new meaning given to Islam begins to tolerate pork eating and de-emphasis religious ritual. This research note argues that existing academic discourses are unable to explain the seeming irony of religious revival and pork eating.